

新华社播发“新华视点”： 保障食品安全 需跨越“四重门”

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问题食品为何屡禁不绝？现行监管体系如何“破”与“立”？“新华视点”记者就此追踪采访了消费者、生产者和国家有关监管部门。

消费者： 根治“四宗罪”有三盼

针对“你最担忧的安全问题是什么”，近日新浪网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位居第一。记者走访发现，当前食品安全存在“四宗罪”——

一宗罪：“药你命”。蔬菜、水果残留农药超标，部分食品中非法使用、滥用添加剂，危害消费者健康；二宗罪：“黑心肠”。每年有大量食品从“黑作坊”“黑工厂”流向市场；三宗罪：“假面具”。部分食品生产、销售者“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四宗罪：“玩概念”。

谈及如何根治“四宗罪”，受访消费者有“三盼”：一盼杜绝“软监管”。二盼食品行业重建诚信体系。“一些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道德底线到了完全丧失的地步。”洛阳市离休干部陈国斌希望，在这方面，与食品行业相关

的协会组织，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三盼自身提高监督和维权意识。

生产者： 自律和他律都不可少

一场打击造假“血燕”的“飓风”近日在全国刮起，不少制假售假者遭到惩处。不过，有“江南药王”之称的胡庆余堂却在这场“飓风”中“独善其身”，早在2008年起就停止销售血燕。

胡庆余堂有关负责人表示，血燕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内在物质是什么，他们因为得不到明确的答案，也没有能力去辨别真伪，所以不敢销售。

老徐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豆腐小作坊，他做的豆腐采用上好原料，虽然卖得贵些，但顾客却络绎不绝。老徐认为，小作坊应加强自律，成立“诚信联盟”，自觉抵制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除加强“自律”外，“他律”也必不可少。

监管者： 需跨“四重门”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等监管者认为，保障食品安全需跨越基层监管薄弱、质量失信惩戒、“以罚代管”“九龙治水”等

“四重门”。针对基层监管力量薄弱问题，蒲长城认为，要加强基层监管部门人力、设备的保障力度。

另外，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局长苏志指出，当前应首先突出“重点食品”监管，把乳制品、食用油、肉类、酒类等消费群体大、影响范围广的重点品种加强集中整治。

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反映出一些生产经营者诚信自律出了问题。对此，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正试点推进质量失信惩戒制度。质量信用档案将记录企业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执行技术规范和标准、履行食品安全承诺等行为的客观信息，对严重违法的企业纳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对于一些地方监管中的“软执法”“以罚代管”等现象，蒲长城表示，必须改变罚款与部门利益挂钩的现状，各级政府应加强监管体系建设和投入。

针对饱受诟病的食品行业监管中的“九龙治水”问题，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说，食品安全必须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目前可考虑建立一个跨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形成部门间既协作又监督的监管新机制。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潘林青 朱立毅 潘莹

对话

张治宇： 多部门管理本身没问题



张治宇
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现代快报：不久前，你给工商部门工作人员上过食品安全方面的课，你怎么看食品安全成为“最担忧的安全问题”？

张治宇：关于食品安全问题，存在一些被夸大的情况。食品安全问题是有，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随着科技的进步，不少食品商家造假的手法难以发现。食品制作有高度复杂性，有很多风险制作者自己也难以预知。此外，商家的道德血液不足。

现代快报：九龙治水却没治好水的情形并不鲜见，有人认为不该九龙治水。

张治宇：多龙治水或者说九龙治水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涉及的领域多，又很复杂，就该多部门管理。如果认为只该一个部门管理，那岂不是可以取消多部门，只需地方政府直接管理就行了？显然不合适。

现代快报：你觉得，多部门管理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张治宇：当这么多机构管理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它们的权限怎么划分，这是个问题。举个例子，豆芽菜算不算食品？如果

是，那么它在流通的过程中，工商部门就应该管。但如果把它算做初级农产品就该归农业部门管。而它的生产又分农业方法生产和工业方法生产，如果是按工业方法生产，比如说无土栽培，那么又该归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管。豆芽菜只是个缩影，我们现在有一部食品安全法，但对于多龙治水格局下的具体分工，讲得不清楚，做不到无缝衔接。食品安全法对此是规定由地方政府来衔接，问题是不少地方没有衔接好，多龙治水时监管就蛮难。此外，各个机构来检验、检测时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一块投入怎么处理？要知道这个投入是很大的。谁来出这个钱？如果出不了这么多钱，那么只能有选择性地来检验，就有可能出现挂一漏万的情况。这样一来，执法的投入跟食品管理中执法对象的广泛性就存在一个不合比例的问题。

现代快报：执法资源应当得到有效配置，你有什么建议？

张治宇：在执法中，有限的执法资源还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比如说检测某个食品时，多个部门都在检测，可能有的项目检了多遍，有的项目却没检。能不能这样做：你检过的我不检。应该在地方政府层面，实现执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值得提醒的是，你要有好的检验机构，如果这种机构很少，能力又不足，执法成本自然就上去了。能不能给予优惠政策，把大学、科研院所的资源都用起来呢？
快报记者 刘方志

今日视点

老百姓为什么会变成“老不信”

接二连三发生的“郭美美事件”“高铁事件”“古董鉴定事件”，深深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和承受能力。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9月8日《人民日报》)
日趋严重的信任危机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说到“不信任”的根源，许多学者都可以说出不少大道理，但在我看来，当下信

任危机的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说真话”。

张维迎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他说：“相当部分官员对社会问题的私下看法与我有多大差别（包括对政府部门的批评），许多人的思想比我还要激进。”可是，一到公开场合，他们就会常常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废话。

在中国，最缺少的是“真话”，最不缺少的是公开的假话。张维迎进一步提到，我们似乎处在“囚徒困境”中：说假话

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搞到后来，说真话反倒成了傻瓜的表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用美国经济学教授戴默尔·库兰的话来说，就是“偏好伪装”：出于自身利益，或者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在这种情境中，一种悲剧性结果出现了：人人都屈从于一个假想的公共压力，导致一个又一个荒诞无稽的谎言被“公开”当作“真理”来“接受”。

全社会性、经常性、习惯性地“偏好伪装”，也导致了公众

对媒体、官员和专家们的集体不信任。“偏好伪装”的社会后果是，人们宁愿相信一个谣言，而不再相信权威和主流。有位作家这样说道：“我们已经习惯了谎言，以至我们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真相。”

累积的不信任和谎言，正在消耗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正在令每个人都陷入信任危机中。要改变这一切，要让真话代替谎言，每个人都应该开始改变，但作为社会风向标的政府和专家，更应该带头拒绝谎言，走出官话套话，让其他群体看到走出信任危机的信心。
(彭兴庭)

公民发言

舆论监督 是化解而非制造矛盾

内蒙古一学生骑车被无盖井“绊倒”受伤，当地记者就此找到信访办，要求其帮助找出无盖井主管单位解决问题，却被有关负责人指责“在制造矛盾”。

(9月8日《京华时报》)
“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这几句话够狠，也够无知。这说明，在众多雷语官员深陷舆论漩涡之际，仍有官员没有吸取教训，他们仍不能正确对待媒体监督。

先普及一下常识吧。权力监督中，原本就有舆论监督，而且在其他监督方式失守的时候，舆论监督尤其可贵。媒体监督不是“惹麻烦”，更不是“制造矛盾”，而恰恰是相反。正是因为纳税人有了麻烦，政府不给解决，才产生了矛盾。这是根本，不是媒体监督才导致了这些矛盾和麻烦。而媒体监督，正好可以督促政府切实履行义务，以减少因失职而给纳税人带来的麻烦，这是在化解矛盾，怎么是在制造矛盾呢？

官员之所以有“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在制造矛盾”的心理，是因为长期以来官员不受媒体监督惯了，看到媒体监督，就立马产生敌意。在纳税人意识不足、民智未开之时，政府和官员可以享受这些不正常的舒服；但在纳税人意识增强、民智开启之后，这一套就行不通了。

“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如此理解媒体监督，是对监督的抵触，也是无知。退一步说，就是为了稿费而监督官员，又有什么丢人的？只要是该拿的，就没有什么不妥。这跟官员正常提供公共服务，纳税人给他们发工资一样。官员领工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记者领稿费，代社会监督。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只要是正常的监督官员，拿稿费就不丢人，丢人的，正是官员的这种态度和无知。
(王攀)

热点纵论

李双江之子打人为何刺痛我们？

9月6日晚，北京海淀区西山华府小区门口，一对夫妻在开车刚要拐入小区南门时，因减速遭到后面一辆无牌宝马车和一辆牌照为晋000888奥迪车的司机殴打。

打人者还高喊，“谁敢打110”。经核实，宝马司机15岁，无驾照，系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

(9月8日《新京报》)
前有李刚之子李启铭，后有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总有一些狂言狂行令围观者愤怒。不过对李天一打人事件，我并无太多的愤怒情绪。

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表明李双江与打人事件有直接关联，正因如此，人们的愤怒，除了对轻狂者的习惯性厌恶，更是在

陈述一种对权力意识代际传递的憎恨。李启铭案如此，李天一打人事件同样如此。非富非贵的围观者，他们会产生感同身受的被殴打与被训斥感，他们甚至会感叹：原来是名人李双江的儿子，果真如此！

每一个围观者都在用自己的情绪为李天一打人事件造句，实际上也呈现了对一些精英阶层的失望——尽管并无直接关联，但对于儿子的大打出手与大放厥词，李双江至少有“父不教”的日常教育失责。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学者和普通公众习惯性地认为，精英阶层应该是社会风气的主导者，他们要有比普通入更高的道德感，并由此去影响民众。

可李天一打人事件流露出

来的，仍是如影随形的拼爹魅影，这种符号化的夸张，令人们无比反感。

尽管李天一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年少轻狂可以理解，不过，无论是那毫不犹豫挥下的拳头，还是那脱口而出的“谁敢打110”，都不像是一种口不择言，而是下意识的发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天一打人事件”并非一起偶然事件，它只是放大式地在为某种流行的社会病毒背书：这种病毒繁衍于许多自认为是“特权者”的心中，并不自觉地被下一代偷窃与继承。

打人事件被围观者瞬间放大，这才是核心所在。一位专家演讲时曾经调侃地说，李刚门之后，他身边几个叫“李铁”的朋友都开始觉得尴尬了。当很多人

开始把自己和“李刚”，也就是不正当的权势区分开来，“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已经成了调侃、嘲讽和切割。很显然，弥漫在李天一打人事件中的，正是某种对“社会不排斥感”与“正义”的寻觅，它们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我爸是我爸，双江是双江”的焦虑呢？

基于类似的焦虑感，我更关心的是李双江对儿子打人事件的态度。

最新的消息是，9月8日中午，李双江到医院探望了被他儿子打伤的那对夫妇，对他们致以诚恳歉意。如果李双江还能就此事件向公众道歉，甚至剖析特权意识生成的根源，打人事件的结局也许就能产生正面效应了。

(王聘)